

博雅文丛

玄学与魏晋南朝诗学研究

蔡彦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博雅文丛

博雅文丛

玄学与魏晋南北朝诗学研究



蔡彦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玄学与魏晋南北朝诗学研究/蔡彦峰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博雅文丛)

ISBN 978-7-02-009805-7

I. ①玄… II. ①蔡… III. ①玄学—研究②诗学—诗歌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B.235.05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4754 号

责任编辑 胡文骏

美术编辑 赵迪

责任印制 李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6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375 插页 2

印 数 1—1500

版 次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805-7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

陈庆元

1990年代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开始招收博士生,也就在这个时期,文学院送去外校培养的博士生陆续回院工作;同时文学院也广招人才,一批学有专长的优秀博士充实了教师队伍,大大改善了教师队伍的学历、学位和学缘结构。2003年,我在一次青年教师的座谈会上,说过这样的话:近年毕业来文学院工作的博士,三五年内都可以发表若干篇论文,其中有一两篇发表在权威或级别较高的刊物上,每位博士都可能出版一部专著,这是非常可喜的;就目前情况看,大家差别不是太大。但是,在第一个三五年之后,随即而来的第二个三五年,大家能不能保持这样的良好势头,就不好说了;到那个时候,可能差距就会拉开,成绩突出的,还可能引起学界的瞩目。

也就在说这些话的当年,我到厦门大学主持王玫教授的硕士生论文答辩,彦峰是参加答辩的硕士生之一。彦峰肤色白皙而不文弱,为人谦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再过三年,即2006年,彦峰在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来福建师范大学求职。而这一年,文学院古代文学学科的教师已经几近饱和。彦峰师从钱志熙先生、葛晓音先生治六朝文学,葛先生和钱先生在六朝、唐代文学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是海内外著名学者。北大中文系

对博士生要求特别严,博士生三年能顺利拿到学位的不是太多。彦峰以其勤奋和悟性,得到校内外专家的好评。钱先生还特地为彦峰的求职写了推荐信。其实,三年前我对彦峰已经有所了解,正好文学院也缺少六朝文学的教师,很快就接纳了彦峰。荒山觅宝,偶得一“璞”,已属望外之喜了,何况钱先生送来的是琢磨过的“玉”!

一年后,即2007年,彦峰的《元嘉体诗学研究》一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同年,彦峰申报副教授,次年被破格提拔。近十年来,无论是本校或外校毕业来文学院任教的非在职就读的博士,两年内获破格晋升副教授的,彦峰是凤毛麟角。

一本专著,若干篇论文,其中有一两篇发表在权威或高级别刊物上,彦峰在一两年内走完了他人起码三年才走完的学术里程。摆在彦峰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条是松口气,歇歇脚;另一条是不松劲、不歇脚,继续前行。彦峰进入博士后流动站,研究更加深入系统了。他在《北京大学学报》等刊发表了一系列水准更高的论文,2010年完成博士后流动站研究报告《玄学与魏晋南北朝诗学研究》,几经修改,今年才交付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从获得博士学位至今,只有六年,彦峰的第二部专著就要出版了,而且两部书都是在高规格的出版社出版的;发表的二十来篇论文,相当一部分登在CSSCI刊物上。比起同期毕业的古代文学博士,彦峰的成果无疑是出类拔萃的。

彦峰的《玄学与魏晋南北朝诗学研究》完成之后,嘱我作序。关于此书的创获,钱先生的序已经多有介绍,不赘述。我想说的只是:目前,两岸四地研究玄言诗的学者,或者注重哲学思辨的思想史研究,或者注重文学意象语言的诗学史研究,很少做到融会贯通的。从《玄学与魏晋南北朝诗学研究》一书中,我们可以看

出彦峰既具有较好的理论思辨能力,对玄学理论和诗歌理论都较熟悉,同时又有较强的文学作品的感悟能力,对诗歌的诠释解读很到位。这是一部融会玄学与六朝诗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著作。

目前,彦峰还承担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士僧交往与六朝文学艺术研究”,同时还和我一道承担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子项目“全南朝文”的编撰工作。彦峰的六朝文学研究的积累逐渐丰厚,并且正在形成自己的研究系列和研究特色,《玄学与魏晋南朝诗学研究》出版了,三五年后,我们一定可以看到他更加厚重的新成果。

在我为彦峰此书作序之时,也许他正背着球拍,和文学院古代文学学科的青年才俊前往羽毛球馆途中。一周之内,彦峰总有一两次出入羽毛球馆,和球友对决,淋漓酣畅而后踏歌而返。彦峰热爱自己的事业,也热爱生活。我是他的证婚人,在婚礼上我赞美新郎新娘:郎才女貌,女才郎貌;郎貌女才,女貌郎才。近乎绕口令,但是大家都听得明白。在场的嘉宾,恐怕没有人会觉得我的话过于溢美。如今,他们的儿子已经长到两三岁了,在和彦峰通电话时,不时可以听到学语声,“小儿咿唔亦好听”。彦峰每次出差都会给他的儿子带小点心或小玩艺儿。我写这些话,似乎已经超出序文的范围了,我把彦峰学术之外的另外一面介绍给读者,或许有助于圈外人对彦峰的了解——书斋之外,彦峰的生活原来也是丰富多姿的!

2012年11月21日午后四时许

序

钱志熙

玄学与诗学,是魏晋时代差不多同时兴起的两种文化事物。其发端皆可追溯至汉末。玄学属于哲学的范畴,诗学则属于艺术的范畴。从本质上看,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循着各自的发生规律产生出来的。所以从诗歌史的角度来研究魏晋诗歌的渊源、发展及演变,和从哲学史的立场研究魏晋玄学的渊源、发展与演变,原是可以各自独立地进行。但是从进一步的探讨来看,那样做显然是不够充分的。这是因为两者不仅具有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且在发展进程上也有一些平行的关系。尤其是从诗学的方面来讲,玄学无疑是魏晋诗学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至于从玄学的方面来说,魏晋时代诗歌艺术的兴起,是否也可以理解成玄学的一种文化背景,诗学是否对玄学也有一种影响的作用呢?这一点历来的学者似乎很少去考虑。但是,从阮籍、嵇康,以及玄言诗人、陶渊明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诗是玄学表达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在心灵世界的层面上,两者更是具有共同的指向。有许多时候,诗人所创造的境界,既是诗性的,又是玄性的。同样,玄学作品也有这样的情况,即同具有玄性与诗性两种精神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甚至可以说魏晋玄学与诗学,如果脱略其形式,常常难以清晰地将它们分开来。它们可以说

是交叉的。如果按照这样的想法,那么魏晋玄学与诗学关系之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具有相当多的探讨空间的课题。

应该说,玄学与魏晋诗歌的关系,是一个传统的研究课题。玄学从其发生之时起,就是诗歌表现的一个重要对象,从正始及太康、元康时期一些具有玄思色彩的作品出现,到两晋之际玄言诗的兴盛,玄学对诗歌内容的影响是明显的。这个现象,早已为古今的诗歌史研究者所注意,并且可以说是魏晋诗歌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玄学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及文学批评的影响,也是备受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如本书多次引证的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就是较早从玄学的本体论、思维方法及自然观、言意观等方面来探讨其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的影响。这篇论文的思考方法,尤其是指出玄学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思想即一种新的哲学理论,对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在内的其他文化活动都有影响,即强调玄学有一种普遍的影响。这是富有新意的,对当代关于玄学与文学研究有很重要的启发作用。但是,总的来看,真正从汤氏所提示的这一角度来研究魏晋玄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这与玄学本身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全面是有关系的。

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思想运动,不是由纯粹的著述与学术领域引发的,而是由汉末清议与清谈开始的。由清议政治、人物引发了一种对政治规律与人物体性的研究,在汉魏之际酝酿出一些新思想,产生了贵无、本无的这样的本体论,出现了体无的思维方式。而在两汉的政治与人物行为中,老庄思想的影响一直是存在的。老庄的文本,到了玄学家这里,其思想的主旨被概括、提炼得更加清晰,他们揭出原本存在于其中的“自然”一词,作为对老庄思想的高度抽象。而从传统的儒家礼教里面,则抽

象出“名教”二字。这样子,玄学这个哲学大厦的栋梁就有了。此后玄学发展的主线,便一直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做种种的思辨,而它对魏晋政治、人物的影响,也是通过对这一对范畴的思辨体认而达到的。人们在名教与自然两者之间寻找、确立种种的政治原则、演绎政治思想,以及制造政治的舆论与口号,也无不体现两者依存的关系。同样,人们的行为方式及社会生活,尤其是知识阶层的行为方式与社会生活,也无不以自觉地体现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为宗旨。正因为这样,汤用彤才说玄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思想、新的哲学理论,“其他文化活动均遵循此新理论之演进而各有新贡献”^①。所以,对魏晋玄学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纯粹的哲学史的范围,而是应该扩大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受玄学影响、被玄学支配的所有文化领域。我们知道,纯粹的玄学讨论,主要是以清谈、谈玄的方式进行的,这部分应该是最集中地体现玄学命题与思考、论辩方式的,但其文本基本上流失了。所以玄学研究中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史料的缺乏。但是如果我们将其他文化活动领域中体现玄学的部分也作为玄学的史料,我们又会看到,玄学的史料其实是极其丰富的。从中我们可以得到魏晋玄学的全貌。

蔡彦峰博士的新著《玄学与魏晋南朝诗学研究》,就是尝试探讨玄学对魏晋、南朝诗学的整体影响。作者并没有停留在直观的、现象的层面上描述玄学对文学的影响,而是深入到哲学观念的内部,寻找魏晋、南朝那些重要的诗学范畴、诗歌创作方法、诗歌作品主题背后的玄学观念的影响。玄学对魏晋诗学的影

^① 汤用彤《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1942年左右讲演,1980年第1期《中国哲学研究》发表,兹据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15页。

响,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玄学中的自然观对诗学的影响,其次是玄学的言意之辨对文学理论、批评方法与创作观念的影响。笔者上世纪末出版的《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初版,2005年修订本),对这两个问题做了探讨,提出了一些看法,如认为陆机的《文赋》的文、意、物三个概念,是对应于玄学的言、意、象而建立的,陆氏的拟古诗对于古诗原作袭其意而变其言辞、物象,也受到了玄学言意观的启发。在研究两晋诗风差异时,则着重梳理了玄学自然观的发展对诗歌表现对象的影响。玄学早期的自然观,主要集中在政治学与人格行为理论的层面上,即在政治上强调自然无为与人格上强调体任自然。至于对自然界的观念,这个时期仍然是继承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合一自然观,即视自然天道为意志之表现。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魏晋时代已有园囿游览、庄园宴集等活动,但对山水的审美意识并未充分自觉。西晋郭象提出的一种自然观,却将自然这一范畴的指向从一般的政治学与行为学引向了自然界的实体。其在阐释《逍遥游》藐姑射之山的神人时,认为这是庄子的一种象征,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就是玄学家所说的体道无为的圣君。他认为“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由此导出黄屋无异于山林的思想。对于其后晋宋的玄学思想影响极大。东晋以后,体任自然由西晋的虚无放诞转为东晋的玄赏山水,从山水自然中体任最高的自然之道,成为晋宋山水发展的基本思想基础。但是上述问题的探讨空间还是相当大的。彦峰的新著《玄学与魏晋南朝诗学研究》,继续探讨言意之辨与自然观对魏晋诗学的影响,在具体论域中有了更深的掘进。如他在研究言意之辨与魏晋南朝诗学的整体关系时,将魏晋之际诗学的古典主义转向与玄学中的言意之辨联系起来,认为玄

学中言意之辩导出了一种古典主义的文学语言观,引出了以“立意造辞”为主要特征的写作策略。这对于解释六朝古典主义诗学的成因,的确是富有新意的。玄学与“言不尽意”论对文学的审美特征的理解与创作方法的影响,历来探讨得比较多。本书中则提出向来被忽略了的王导等人“言尽意”论对晋宋诗歌变革可能存在的影晌,认为“言尽意”论启发了晋宋玄言诗人、山水诗人努力地使用多种修辞方法来表现名理与景物,这也是一个新的观点。玄学自然观对诗学的影响,可以说是更为直观、多方面、多层次的,本书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少掘进,在探讨刘勰的文学观念,以及阮籍、嵇康、陶渊明、谢灵运的诗学倾向时,都重视其中自然思想的影响。

如前已述,彦峰《玄学与魏晋南朝诗学研究》是尝试对玄学与魏晋南朝诗学的整体关系进行研究,这一立意就已经超越前人著作在这个课题方面的探索力度。其中第三章《玄学与魏晋南朝诗学的发展》,就尝试将魏晋诗学的整体发展过程,纳入到与玄学关系的层面上来考察。其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认为玄学对魏晋的诗歌艺术观念产生了影响,其具体的表现就是从缘事而发的观念变化为“课虚无以责有”的写作方法,使得汉魏的叙事诗学走向衰落。汉魏叙事诗学的衰落与六朝体物、写景等诗学的兴起,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诗学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其中原因,并非只有思想意识的转化这一项,但思想意识及文人精神风貌的转变,无疑是重要的因素。本书明确地提出这样一种看法,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本书在研究上之所以能有比较突出的推进,还在于作者不仅重视从玄学的整体中探讨诗学的成因,同时也从重视诗学本身的整体性,能从汉魏六朝诗学的整体出发来思考问题。前举其关注汉魏六朝诗学从缘事

而发到“课虚无以责有”的变化,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考。同样,书中论述玄言诗对传统的兴寄艺术的发展,也是注重以传统诗学的方法探讨诗学与玄学关系的一例。比兴是一种传统的诗学,是先儒对《诗经》的创作方法的一个概括。近人的研究更将比兴推进到其原生状态,即歌谣的比兴方法。但是,典型的歌谣式的比兴,在文人诗中并不占主流。汉魏诗人还多用传统的比兴之法,六朝诗人则以山水、物象为主。在以写景物为主的山水诗,以及咏事物为主的咏物诗中,其与传统的赋、比、兴是怎样的一种对应关系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写景与咏物,因其中主体的寄托的有无,而分别地歧向于赋写与比兴两端。晋宋的山水诗,原是以山水体道的活动的一种表现,山水蕴含着道,由此而言,其基本的艺术方法,其实是属于比兴一端。也就是说,晋宋山水诗的一部分,是以山水来兴寄主体的精神。彦峰从兴寄方法的角度来研究玄言诗,无疑是对玄言诗艺术特点的一种新的阐述。

关于玄学及其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文化的关系,是一个有着广阔的探索空间的学术课题。彦峰的这本书,是这方面研究的可喜成果。他在接受前人关于玄学以及玄学与诗学关系的基础上,做出了新的探索。我相信,这是一个扎实的、对学术的积累有所贡献的成果。彦峰在2003年至2006年在北大就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了题为《元嘉体诗学研究》的博士论文,并于200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毕业后赴福建师大任教,并在陈庆元教授的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这篇论文就是在他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修改的。博士学位与博士后流动站都是一种教学与学术的体制,体制对学者有一定的限制,也有负面的作用。目前,教学与学术体制对于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的

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但我仍然相信,事在人为,一个优秀的人才,是能最大程度地利用体制的优势而克服其负面作用的。彦峰在博士与博士后阶段所做出的成果就是一个例子。他能够取得这么好的学术成绩,得力于他的勤奋与执着探索的韧劲儿。希望他在今后学术研究中保持这种良好的势头,融通贯透、上下溯回,探寻文学史与思想史、文化史之间的内在联系。

是为序!

2012年9月23日于京寓

引 言

魏晋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阶段,玄学则是此期学术的主要内容。玄学虽由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发展而来,但相对于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而言,魏晋玄学又是中国文化之歧出,这一歧出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容量和内涵,牟宗三先生谓这种歧出为“文化生命之大开”^①。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时期,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及文学的各种基本范畴得以确立和发展,因此此期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玄学,与诗学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内在关系,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建构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本书即选择玄学这一视角,来探讨魏晋南北朝诗学的相关问题。本书所说的“诗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②,既包含诗歌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也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理论。

① 牟宗三《才性与玄理》原版自序之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传统“诗学”一词的内涵可以参见钱志熙《“诗学”一词的传统内涵、成因及其在历史上的使用情况》,《中国诗歌研究》第1辑。

玄学对诗歌的影响,在南朝时期就得到了比较多地关注,如檀道鸾《续晋阳秋》、钟嵘《诗品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及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对此都有精辟的论述。作为魏晋学术思想的主流,玄学的思想、方法,对魏晋南朝的文学创作与理论建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汤用彤先生《言意之辨》、《魏晋文学与思想》等文指出玄学与魏晋文学之基本原理有内在的关系,为玄学与魏晋南朝诗学这一课题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玄学与文学的关系逐渐成为学术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出现了诸多这方面的论著,如卢盛江《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徐国荣《玄学和诗学》、唐翼明《魏晋文学与玄学》、皮元珍《玄学与魏晋文学》、刘运好《魏晋哲学与诗学》、黄应全《魏晋玄学与六朝文论》、黄金榔《魏晋玄学言意之辨及其对后代诗学理论之影响》等,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论文。总体来看,从玄学与文学这一交叉学科的角度来探讨魏晋诗歌的发展,是目前魏晋诗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学界前辈和时贤在一定程度上,对此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但就系统性和深入性而言,还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目前学术界对玄学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玄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上,而对玄学与文学基本原理、基本范畴的内在关系仍缺乏深入的研究。这是造成目前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还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的基本原因。有鉴于此,本书力求从诗学的基本问题出发,来探讨魏晋南朝诗学与玄学的内在关系。

从逻辑上来讲,有诗歌就有诗学,厄尔·迈纳《比较诗学》

将诗学划分为原创诗学与含蓄诗学两种类型^①,也就是以理论形式和实践形式存在的两种诗学。先秦以来儒家在阐释《诗经》的基础上建立了理论形态的诗学,但是从传统诗学的发展来看,唐代之前主要是以“含蓄诗学”为主的,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比较缺乏诗学理论的建构,但由于诗歌创作的活跃,此期诗学的发展却仍是很充分的。因此对魏晋南北朝诗学的分析,应从理论与实践这两种诗学形态入手,这也是本书一个基本的研究思路。诗学是一个有关诗歌写作的学问系统,严羽《沧浪诗话》:“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②“多读书,多穷理”,即属“学”的部分,我们所谓的诗学,就是指诗歌创作中可以通过学习而掌握的方面。从这一方面来讲,可以说诗学本身就是一种学术,它与当时代的思想学术是密切相关的,并以之为自己生成、发展的基础^③。从这一点来讲,魏晋南北朝诗学与玄学是存在密切关系的。

相对于汉代儒学朴实的特点,玄学在抽象与思辨上有极大的发展,为深入地认识文学创作规律、进行系统的文学研究及文学理论建构提供了思辨的、分析的思维方法。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魏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都进入了新的阶段。魏晋玄学与诗学之间的关系,并不局限于诗歌表现的内容上,某种意义上讲,玄言诗对玄理的表现与演绎,只是玄学影响于诗歌的一个方面甚至是一个比较消极方面。玄学对魏晋诗歌审美趣味、风

①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② 严羽《沧浪诗话》,《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88页。

③ 拙著《元嘉体诗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7页。

尚的影响,这些也属于玄学与诗学关系中比较直观、浅层的方面。文学批评是以文学基本范畴的建构为核心而展开的,诗学的发展也往往体现在一些基本的诗学范畴的内涵的发展,以及对诗歌发展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处理上。因此就具体研究方法而言,我们对玄学与魏晋南北朝诗学的关系的研究,将注重从基本的诗学范畴和诗歌史问题着手,如玄学“言意之辨”与诗学的“言”、“意”范畴的关系、“言意之辨”与诗歌的语言转向、“言意之辨”从“得意忘言”到“言尽意”的发展及其诗史意义、玄学自然观与“体物”诗学的产生、“自然”作为文学批评范畴的确立、玄佛合流的诗学意义等,这些都是玄学与魏晋诗学中基本的又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通过对魏晋诗学的基本范畴及诗歌史基本问题的分析,探讨玄学与魏晋诗学的建构与发展的内在关系,是本书一个基本的研究思路。

二

玄学对诗学的影响虽是多方面的,但是诗歌与哲学思想体系毕竟有不同的性质,因此本书探讨玄学与诗学的关系,并非以用玄学的思想方法建构一个诗学理论体系为目标,而是探讨玄学与魏晋南北朝诗学和诗歌史的基本问题的内在关系,各章节皆以具体的问题而展开,所以本书各章虽相对独立,但在与玄学的关系上又有内在的关联。

本书分为六章。

第一章,探讨玄学“言意之辨”与诗学的关系。

“言意之辨”是玄学基本的思想方法,对魏晋文学理论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是魏晋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但是当前对